

1921-2011 建黨90年

# 讓百姓錢包脹速與經濟增速同步

# 中共努力破解分配難題

對於執政黨而言，一個不可迴避的緊迫和重大挑戰是，如何讓百姓的錢包鼓脹速度同步於經濟的高速增長，如何扭轉社會貧富差距日漸擴大的現實困局。「當前，無論從微觀還是宏觀層面出發，無論從生產還是消費環節着眼，收入分配領域的公正與否，都是關乎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10日報道，最近一段時期，「個稅起徵點提高至多少為宜」的話題，在中國各界引發持續熱議。事實上，類似個稅調整、提高工資收入、打破行業壟斷等事關國民收入分配、縮小貧富差距的衆多議題，近年來日益成為牽動中國民意神經的「敏感區域」。

2011年不僅是中國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開局之年，亦是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第90個年頭。90年來，實現民富國強，為中共一以貫之的前進方向，不斷提高民衆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則是中共分配政策的終極目標。

## 貧富差距已近「紅線」

毋庸置疑，現已躍升至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徹底告別了自近代以來積貧積弱，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經濟發展奇跡證明了中共與時俱進的執政能力與活力。

但近十年來，中國居民收入在財富分配中所佔比例呈持續下降態勢已是不爭的事實。中國社科院在其日前發布的一本藍皮書中指出，在中國，作為判斷收入分配公平程度指標的基尼系數已高達0.47，而GDP總量剛剛被中國超越的日本只有0.25。輿論普遍認為，中國貧富差距已接近社會所能忍受的「紅線」。

中國商務部質研院專家梅新育指出，平等的收入分配格局，在任何國家都有利於擴大有效需求總量，二戰後日本社會收入分配平均程度長期為西方主要國家之最，正是這種較為平均的收入分配格局令日本迅速完成了大件消費品的普及。

## 破解「中等收入陷阱」

中共與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認為，判斷經濟工作和分配問題的得失標準，歸根到底要看能否解放生產力。但回顧歷史，在新中國初期完成生產資料所有制改造之後，為建立一個純粹公平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中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排除了按勞分配之外的其他收入方式，這對生產力的發展產生了桎梏，隨後而來的文革更使中國經濟一度瀕臨崩潰邊緣。

痛定思痛。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領導人從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突破，打破了平均主義和「大鍋飯」，提出了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分配制度，開啓了改革開放新局面，中國經濟由此進入快車道。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後富」，是黨和政府改革起步時對全體國民的莊嚴承諾，梅新育表示。值得關注的是，鄧小平曾經作出過「中國發展到一定程度後，一定要考慮分配問題」的前瞻性判斷。

及至2002年，中共十六大報告已指出，理順分配關係，事關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和積極性的發揮，要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既要反對平均主義，又要防止收入懸殊。國際經驗表明，當一國工業化、城鎮化加快發展到某一歷史階段，往往會出現收入差距拉大問題。如何破解「中等收入陷阱」，讓更多人能夠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近年來中共高層對此一直高度重視並加速付諸實踐，因為這不僅事關社會公平和穩定，並同中國致力解決消費不足、擴大內需的發展戰略轉型密不可分。

## 事關共和國家命運

2010年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發布公報，將保障改善民生及收入分配結構調整提升至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新高度，同時提出未來五年的務實發展目標。「十二五」規劃更首提「改善民生十大行動計劃」和「城鄉居民收入增長不低於GDP增長」等量化發展目標，就是要讓百姓「有錢花、敢花錢」。

中國官媒在一篇評論中指出，目前中國的收入差距既嚴重影響着社會公平，同時也成為影響效率進一步提高的一個重要因素。

中國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說：「如果中國的收入分配處理不好，改革取得的成果可能就會被沖倒。小平同志把它放到黨和國家命運的高度看。」

當下中國已經經攪努力解決收入分配難題的號角。但不少研究者認為，此項調整和改革將面臨幾十年來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團和政策路徑依賴等因素的挑戰，非朝夕之功。不過，經過90年風雨洗禮，中國共產黨總能正視前行的艱難險阻，前瞻性地預判形勢，並加以解決。因此，可以相信，作為執政黨的中共當能盡快推出切實可行的政策，在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規範收入分配秩序、加快城鄉經濟協調發展、促進地區經濟平衡增長等多個領域穩步全面推進，滿足各族人民過上共享共富而舒心日子的新期待。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10日向境外30多家駐京媒體開放。

中新社

## 首次向境外記者開放 中聯部細述黨際交流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10日報道，繼4月份向國內網媒開放後，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10日再次對外開放，首次邀請境外媒體記者參加以「走進中聯部」為主題的開放日活動。

中聯部新聞發言人黃華光首先就中聯部的職能、機構設置及中共對外工作的基本情況向記者做了介紹，並陪同記者參觀中共對外交往工作90年圖片展。

在隨後的座談會上，中聯部副部長艾平就黨際交流介紹了中共在這項工作中所遵循的「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的四原則。

他表示，中共主張超越意識形態差異，謀求相互理解與合作，以開放的姿態與世界各國各政黨廣泛交往，目前已同世界上160多個國家的600多個政黨或政治組織建立了各種形式的交往和聯繫。

有記者問，是何原因使中共黨際

交往從過去只與共產黨或工人黨接觸，轉變為與各國的執政黨、在野黨接觸。艾平說，這顯然與國際形勢和中共本身的變化有關，中共一貫堅持與時俱進，中共的決策都與它對世情、國情、黨情的判斷密切聯繫，世界形勢發生變化，它的路線方針政策自然會有變化。

有尼日利亞記者關心中共與非洲國家政黨之間的關係，艾平說，中國與非洲國家有傳統的友誼，中共也積極發展同非洲政黨之間的關係，不久前中共和納米比亞人組黨聯合舉辦了首屆中國非洲青年領導人論壇，「這表明我們希望把這個友誼世代傳遞下去」。

座談後，記者還現場觀摩了中共與莫桑比克解放陣線黨兩黨工作會談。

此次開放日活動，境外30餘家媒體的近40名記者和20餘名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的外籍員工代表受邀參加。

特稿

## 黨史宣傳注重「80後」

本報實習記者 隋曉姣



▲年輕遊客在古田會議紀念館內參觀 新華社

隨著建黨90周年慶的臨近，黨史類書籍和影視作品頗成熱點。值得一提的是，無論是圖書還是影視劇，今年的獻禮之作都更加注重研究「80後」、「90後」年輕讀者的心理，因而也就更顯得時尚化和通俗化。

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志忠近日在新聞發布會上提出，8日開通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網」非常適合「80後」年輕人瀏覽閱讀。這一經媒體報道，立刻被解讀為一種信號：尊重市場經濟的規律，用年輕人的審美來解讀歷史，從而讓其認識黨史。

黨史類的書籍也開始吸引年輕讀者。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金一南的《苦難輝煌》銷量突破10萬冊，熱烈反響多來自青年人：「生動、有料、做普及讀物挺好」。同樣，人民出版社的《黨史細節》也是不追求面面俱到、突出歷史鮮活性的黨史讀物，單看目錄是以重要歷史事件為脈絡，導讀卻多呈現了飽滿的人物故事或情節曲折的橋段。《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則通過十三個為什麼串聯黨史，從建立新中國到高效抗震救災、成功舉辦奧運會，對於共產黨犯過的錯誤亦不避諱，這得到了年輕讀者的認可。

與建黨80周年樸素而傳統的徵文、知識問答方式不同，建黨90周年的黨史宣傳帶着鮮明的時代印記。從《恰同學少年》到新晉「90後」謀女郎挑樣的《湘江北去》，飾演領袖必須使用特型演員的時代已經過去，隨之而來的是偶像化、青春化、娛樂化和情感化的新創作期。電視劇《我的青春在延安》收視率頗高，製片方在百度同名貼吧中發起追劇原因的民意調查，結果57.8%的人選擇「因張傑而來」……

黨史、黨建的宣傳也要突出可讀性、可看性——幾乎所有的暢銷黨史書籍和實座大片都自覺或不自觉地貫徹這一原則。

【本報北京十日電】

## 《黨史細節》摘編之五

# 走上井岡山 星火終燎原

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人被迫轉移到農村山區，尋找落腳點，以保存力量，再圖發展。上井岡山不容易，要養活一大攤子軍隊更不容易，但短短幾年間，革命的星星之火，漸燃成了燎原之勢。重溫這段艱難卻至關重要的井岡歲月，很多人會好奇：共產黨人在井岡山究竟挖到了什麼寶藏？其實，那是在青翠的井岡山間，共產黨人尋找到了實行「耕者有其田」而提高生產力達至自給自足的「經濟模式」。

●毛澤東寫信向「山大王」袁文才說明來意，袁回覆「片林不棲大鵬，請另擇坦途」

要想上井岡山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山上真有「山大王」，也就是袁文才和王佐。袁、王二人都是窮苦出身，大革命高潮時也參加過革命，袁文才還是共產黨員，他們一個駐在山上的茨坪，一個駐在山下的茅坪，成犄角之勢。

對於如何解決袁、王問題，開始軍內很多人認為，他們不就是100來人，幾十支槍，將他們繳了械，不就行了。而毛澤東則不這麼認為，「我們不能採取大魚吃小魚的吞併政策，三山五嶽的朋友還多呢！歷史上有哪個把三山五嶽的土匪消滅掉？三山五嶽聯合起來總是大隊伍。」於是，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送到山上說明來意，袁文才回覆了一封婉言拒絕了紅軍上

山的要求，信中稱：「敵地民貧山瘠，猶汪池難容巨鯨，片林不棲大鵬。貴軍馳騁革命，請另擇坦途。」但是，既然紅軍已經到了家門口，怎麼也得見面，袁文才就約在大蒼與毛澤東見面。袁文才事前做了準備，埋伏下了人槍，擺了一齣鴻門宴。毛澤東輕裝簡從，而且一見面就送了一份厚禮，給了他們一百支槍。袁、王二人對毛澤東的慷慨舉動頗為感動，但仍沒有徹底解除對紅軍上山的疑慮。這時毛澤東讓了一步，提出先把傷員和醫院放到山上。袁、王感覺這構不成什麼威脅，就同意了。毛澤東帶領着隊伍，在井岡山地區又打了一陣子游擊，通過做工作逐步消除了二人的疑慮，最終才將隊伍帶上了井岡山。（摘自《黨史細節》P83-P84）

●工農革命軍落腳井岡山之後，面臨的首要問題是部隊給養問題，特別是吃飯問題

毛澤東帶領工農革命軍歷經周折終於落腳井岡山，然而上山後面臨的形勢可謂困難重重：「在白色勢力的四面包圍中，軍民日用必需品和現金的缺乏，成了極大的問題。一年以來，邊界政權割據的地區，因為敵人的嚴密封鎖，食鹽、布匹、藥材等日用必需品，無時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貴之中，因此引起工農小資產階級群眾和紅軍士兵群眾的生活的不安，有時真是到了極度。紅軍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籌餉。每天除糧食外的五分錢伙食費都感到缺乏，營養不足，病的甚多，醫院傷兵，其苦更甚。」可見，工農革命軍落腳井岡山之後，面臨的首要問題是部隊給養問題，特別是吃飯問題，經濟困難是「邊界割據的致命傷」。到了1928年4月，朱、毛會師後，這個問題就更



▲「朱德的扁擔」的故事激勵了很多人 資料圖片

嚴重了。以每人一天吃一斤半米計算，一萬人一天就要吃掉一萬五千斤米，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數字，而井岡山根據地，東西南北方圓「共計五百五十里」，「人口不滿兩千，產穀不滿萬擔」，由此可見部隊給養問題之嚴重。（摘自《黨史細節》P85-P86）

●「人不能老走着站着，也得有坐下來的時候，坐下來靠屁股，根據地就是人的屁股」

解決部隊給養問題的最初辦法很簡單，就是打土豪，因為打土豪既可以掃除革命的障礙，又可以鼓動農民起來革命。但土豪的存糧和資財也是一個積累的周期，不能今天打完，隔兩三天再來一遍。毛澤東曾經回憶道：「從前我在井岡山打土豪時，曾到一個土豪家裡去看有沒有書，一個老媽媽走出來問我來幹什麼，我說來找東西，她說：『昨天已經共了產，東西都共掉了，現在沒有東西可共了。』」

粟裕曾經回憶說：「毛澤東同志很注意對部隊進行建立根據地思想的教育。他常說，人不能老走着，老站着，也得有坐下來的時候，坐下來就靠屁股，根據地就是人的屁股。毛澤東同志深入淺出的比喻，很有說服力。」如何才能把井岡山這個「屁股」坐穩呢？僅僅打土豪，顯然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和長久

之計，最重要的還是要得到廣大農民的真心支持，而要獲得農民的支持，就要給他們看得見的實際物質利益。農民最強烈的渴望是什麼呢？是土地！毛澤東提出了「深入割據地區的土地革命」的政策，把它看做在羅霄山脈中段建立鞏固的革命根據地的基本條件之一，並且領導了邊界各縣轟轟烈烈的分田高潮。而分地又是一項十分複雜的事，需要組織來領導，這樣在廣大農民的擁護下，寧岡、永新、茶陵、遂川等縣的基層黨組織逐步恢復了起來，並都建立了工農蘇維埃政權。農民從分得土地這個活生生的事實中，看清了紅軍確實是為他們的利益奮鬥的，而要保衛自己分到手的土地，防止地主的反攻倒算，就要支持紅軍的發展，由此支持紅軍的發展就成為了廣大農民的自覺行為。1928年土地革命勝利分田後，獲得空前的豐收。自寧岡縣工農兵政府徵收土地稅以來，縣內農民踴躍交售，徵糧比例高達20%。在極短的時期內，該縣便籌集了幾十萬斤稻穀，所以毛澤東記載說：「至紅軍給養，米暫可從寧岡土地稅取得」。為了將糧食運到山上，展開了挑糧運動，「朱德的扁擔」的故事就是這麼來的。（摘自《黨史細節》P86-P87）

（經人民出版社和《黨史細節》作者羅平漢授權刊登）

